



一部奇书,四位名人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皇帝钦撰的御书,他曾因想使该书家喻户晓,而一度将其刊行全国。雍正帝一死,其子乾隆皇帝甫一即位就宣布其为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大义觉迷录》成为一部罕见的由父皇撰写,儿皇帝查禁的御制国书,其湮没了二百余年不见天日,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书正与雍正朝著名的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密切相关。

吕留良(1629-1683),一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七年(1660)二十五岁时始参加科举,中秀才,此后连年周旋于科场,心迹相违,苦闷已极。顺治十七年与浙东余姚著名学者黄宗羲、黄宗炎兄弟结识,通过他们又相交宁波隐士高斗魁等。黄、高等名士永不仕清的气节,促使他思想产生极大转变,他认为所谓不仕清,不仅不参加科举做清朝官吏,而且要拒清,勿与当局合作,勿与官吏来往,遂隐逸山林,颐然自得,尤其不时摇弄笔墨,恋昔非今,蔑视现政。其文中一再强调华夷之分,怀念明朝,认为“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提倡反清复明,曾作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康熙五年(1666),他执意不再入科场,弃诸生,归隐故里南村,躬耕陇亩,以“天盖楼”为名刻选时文,著述授徒,声名大噪,被人们尊为“东海夫子”。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开“博学鸿词科”,浙省大吏推荐他,他誓死不从。第二年,郡守又欲以“隐逸”荐举,他吐血满地,枕上剪发,身披僧服,出家当和尚,更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在民间流传,影响深远。

曾静(1679-1735),清永兴县

清雍正朝曾静投书谋反案

文
赵晓耕

人,康熙十八年生,县学生员。雍正五年(1727)应试靖州再次不中,转而以授徒为业,号蒲潭先生,得读吕留良所评点时文,中有论“夷夏之防”等语。派门人衡阳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时吕留良早死,其子吕毅中将乃父遗书全交张熙。曾静见吕留良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愈加倾心。因与吕留良弟子严鸿逵及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来投契,每赋诗相赠答。曾静所著《知新录》中谓“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又称:“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

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夺。”恰逢此时,社会上有传闻说雍正帝与四川提督岳钟琪矛盾加剧,曾静认为此机可乘,派学生张熙带自己拟好的一封书信,游说岳钟琪背叛朝廷。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其父官至四川提督。岳钟琪在西南边疆屡立战功,康熙六十年(1721)官至四川提督。雍正元年(1723),因征讨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有功,由大将军年羹尧奏授参赞大臣。三年七月,接替年羹尧为川陕总督。八月,他与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寺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等,各举发年羹尧罪状,表示与年划清界限,不久加兵部尚书衔。

川陕位置险要,南可以遥控云贵湖广,北可以牵制冀豫京都,是清王朝西北边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朝廷联络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地的大本营。自康熙十九年复设川陕总督以来,因为此职务的重要性,定例改为满缺(唯满族贵族可以出任)。岳钟琪以汉官高升此职,无疑引起满朝震动,诽谤、诬陷者有之,嫉妒、攀结者有之,使他如履薄冰。想造出点事端的人就传说他是宋代岳飞的后代,说什么宋被金灭,明被后金灭,金与后金都是异族,于国于家,岳钟琪也要为宋、明复仇。

雍正五年(1727),岳钟琪奉命驻扎四川成都,有一天在府城内,忽有一名叫卢宗汉的男子,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欲行造反!”号召人们“从岳钟琪谋反”。对此雍正帝谕内阁:“数年以来,在朕前谗谤岳钟琪者甚多,不但谤书一筐而已,甚至有谓岳钟琪系岳飞之后,伊意欲修宋、金之报复者。”“岳钟琪懋著功勋,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而奸邪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结果,卢宗汉被当作疯子煽乱砍了头,但持此说的大有人在。这也是岳钟琪的一块心病。

岳钟琪撤清, 张熙投书惹案

雍正六年, 张熙与叔父张勘带着曾静的书信赶赴成都。但此时, 岳钟琪已就任川陕总督, 身在西安。九月十三日, 张熙、张勘追至西安。经过一番打探, 他们发现事情不象传闻所说皇帝与总督心存芥蒂, 劝说岳钟琪谋反并不可行。于是, 张勘先回湖南, 而张熙终觉心有不甘, 坚持留下, 无论如何也要将书信亲自交到岳钟琪手上。九月二十六日, 张熙在衙署街前拦下岳钟琪的轿子, 说有书信相交, 信封上写有“南海无主游民夏靛遣徒张俾上书”几个字。岳钟琪一见“南海无主游民”便明了一切, 向他传递书信的人根本不承认清王朝, 认为自己不归清王朝管辖, 所以自称无主的游民, 这有谋反的嫌疑。他早已处变不惊, 只叫人将张熙捆绑进衙门再行询问。张熙心知说服已不可能, 便下定决心只字不吐, 打算一死了之。岳钟琪知此事非同小可, 为了摆脱嫌疑, 他马上通知同在一城的陕西巡抚西琳和按察使司(一省司法长官)硕色共同审讯。重刑询问毫无结果。岳钟琪不敢长时间扣留张熙, 唯恐遭致猜疑, 于是将此事密折奏报雍正, 准备将人押解进京, 由皇帝亲自审断。雍正皇帝显得颇为开通, 在奏折上一面安抚岳钟琪, 表明用人不疑的态度, 一面命令采取其他办法套取口供。

岳钟琪受命, 与西琳、硕色商讨对策。一日, 岳钟琪设立香案, 请来张熙, 对他好生夸奖, 表明之前用刑纯属不得已, 只是想借此试探, 而今已深信不疑, 愿焚香发誓共谋反清义举。张熙大为感动, 将上书始末详细叙述, 并夸口老师曾静影响力非同寻常, 在地方可以一呼百应。岳钟琪暗自心惊, 立刻将审实的结果再次密奏雍正帝。雍正派人赴湖南捉拿曾静。

与此同时, 岳钟琪又从张熙那里了解到更多信息。曾静之所以让张熙

来投书谋反, 完全是受到了浙江石门吕留良思想的影响。此外, 雍正登基不久便开始打击争夺帝位的失败者, 其中一些人被判流放广西等边远地区。流放途中, 失势者不免造谣生事, 流言散落各处, 更增强了曾静反清的决心。岳钟琪感到事态严重, 若果真如张熙所言, 曾静能够一呼百应, 将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他再次向雍正帝上奏密折, 折中建议逮捕吕氏一门。十月中旬, 雍正帝将岳钟琪的奏折, 由内阁以廷寄的方式转给浙江的地方大员李卫, 命李卫亲自来督办案件, 将吕留良家人如数抓拿归案。

十一月初, 雍正帝从京城先后派出两位重要官员到湖南与岳钟琪会同审理此案, 一位是副都统海兰, 一位是刑部左侍郎杭奕禄。派出海兰作为钦差, 雍正自有一番考量。清王朝军事制度特殊, 有两大军事系统: 提督掌管地方武装, 维持地方治安; 都统掌握驻防八旗军, 直接受命于朝廷, 所有官员必须是满人。副都统海兰的到来, 主要是在军事上牵制岳钟琪。此二人到达湖南长沙后与岳钟琪、西琳和硕色的人共同抓捕与曾静有关的案犯, 包括在地方上和曾静有书信往来的人, 特别是与曾静有师生关系的人, 其中就包括张熙的父兄。

雍正六年年底, 相关案犯全被抓获。在审讯中, 曾静显得相当镇定, 事虽败露, 但官府手中并无造反证据, 自己更不具备张熙所说的影响力, 于是表现出一种很合作的态度。岳钟琪等人安心不少, 认为这不过是一起寻常的读书人闹事案, 不足为惧。雍正帝御批奏折, 称此事需从长计议。

雍正七年三月十日, 皇帝颁谕旨将曾静等人押解进京, 还特别在奏折中说明沿途官员不得虐待案犯。一行人押到京城之后, 雍正帝亲自审问曾静和张熙, 将其余人及从浙江进京的吕留良家人交给刑部审理。经过五月、六月的多次询问, 曾静在雍正帝

一番批驳开导之下幡然悔悟, 认罪态度良好, 共留下四十七份口供。而雍正帝前后发布十道谕旨, 想要通过对这个案件的处理达到一系列政治目的。

《大义觉迷录》刊行, 投书案的出奇料理

清初以来, “华夷之辨”思想广泛存在于民间, 特别是读书人头脑当中, 雍正认为荒谬的“华夷之辨”是此案的核心。曾静受吕留良思想影响很深, 认为华夷之辨重于君臣之别, 若不是同族同类, 就不必讲君臣之谊。在给岳钟琪的书信当中, 曾静明确指出, “夷狄即是禽兽”, 满洲人统治中原八十年, 地震天怒, 鬼哭神嚎, 这是上天的警示。此外, 他还列举坊间盛传的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条罪行, 谴责雍正帝是一个失德的暴君, 根本没有当皇帝的资格, 人人皆可反之。雍正帝发现这些言词只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延伸, 便决心以曾静案为突破口, 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一问题。七月, 雍正帝命人将曾静的四十七篇口供, 张熙的两篇口供以及自己的十道谕旨汇编成一部书, 取名《大义觉迷录》。

九月, 《大义觉迷录》刊刻颁行。这时, 雍正帝认为曾静谋反, 主要是受到吕留良反清思想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 吕留良才是主犯, 曾静不过是一个模仿者。雍正帝摆出一副皇帝应该具有的公允面貌, 发一道谕旨, 让九卿商议如何处断吕留良, 同时也明白表示出自己的意见, 即吕留良才是不可饶恕的罪人。

十月六日, 负责审案的有关官员上呈一道奏折, 拟将曾静及张熙处以极刑。清代法典中, 并没有针对文字狱的专门条文, 但是按照过往成例, 因文获罪的犯人通常被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而凌迟处死。雍正帝并不接受这一结果, 而此前, 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



奏折中表示要“出奇料理”此案。此后,他确实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处置。

雍正帝认为,曾静虽罪不容赦,但是他并没有实质谋反的行为,且他谋反的思想根源并不在其本人。而且,从某种角度说,正是由于曾静投书谋反的举动让朝廷了解到这样一种流传于社会的反清思想。因此,雍正皇帝在朱批里写道:从这样的几个角度来衡量,曾静也“不为无功”。

抛开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曾静那封谋反信的内容深深刺痛了雍正帝。从更深层次来看,这起谋反案的背景非同小可。此时已是雍正七年,像曾静、张熙这样深居穷乡僻壤的读书人,却还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指责雍正帝夺嫡篡位,质疑其继位的合法性,这当然让雍正心中大为不快。

雍正帝也由此知道了散布不利谣言的正是夺嫡失败的兄弟:康熙第八个儿子胤禩和第九个儿子胤禵。雍正帝不杀曾静的目的在于,他想借此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使如曾静这般的有谋反之心的人,只要能够真心悔过,都可获得宽免。雍正帝想通过对曾静的处断,进一步分化瓦解那些潜在的反对他的胤禩集团的残余势力,并且消弭读书人反清的思想意识。

实际上在这个案件之前,雍正帝就有过辱而不杀类似做法,这就是雍正四年的钱名世案。在读书人中颇有声望的钱名世与年羹尧过从甚密,二人曾有和诗之举,钱名世在诗中多有恭维。后年羹尧因被指认四十多条大罪而处死,钱名世也因文获罪,难逃一死。但是雍正帝为刻意表现出宽宏大量,虽对读书人的异己思想深恶痛绝,仍然没有处死钱名世,而是想出了一个羞辱的办法。他为钱名世题了一块匾,上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命令地方官将这块匾挂在钱名世祖宅的大门上,特别谕令地方官,每

个月的初一、十五前去视察此匾是否安然无恙。雍正帝犹嫌不足,还要动员所有在朝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仿效古人以诗赐恶,命令朝臣们每人写诗一首,专门讽刺挖苦当时读书人敬仰的钱名世。据说在这些诗词当中,雍正帝最赞赏“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共奸”一句。第一句中,前一个“名世”指钱名世,而后一个名世指的是康熙年间的戴名世,此人也因诗文而获罪。第二句也是对仗工整,其中,前一个亮工是指的钱名世的字亮工,而后一个亮共则是罪大恶极的年羹尧的字。由此可见,雍正帝十分善于羞辱政治思想上的异己份子。而到此案,雍正帝同样留下曾静不杀,命刑部左侍郎杭奕禄全程监督曾静到苏州、杭州一带去四处宣讲“华夷之辨”思想的反动性和自己经皇上开导批判后的悔恨心情。

雍正七年年底,曾静按照雍正帝旨意,被发回湖南,进入“整俗观风使衙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构,在清代既普遍存于所有直省,也不始终存在于整个王朝,现在也没有史料证明,这个衙门是否跟这一案件有直接关联。考虑到读书人对曾静由反清到媚清的行为而产生的不齿甚至戕害之意,雍正帝特别颁发两道谕令,声明对暗中残害曾静的人一定严惩不贷。这就是雍正帝所谓的“出奇”部分,意在树立一个反面教材。

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揣摩皇帝的心思,上呈了一道奏折,拟定了对已经过世五十余年的吕留良的处罚。清律当中有个别针对在实施刑罚之前就已去世的人的处罚规定,就是所谓的戮尸。戮尸在清代法典当中,是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强盗一类犯罪,比如说杀一家三口,或者结伙为盗的这种首领,就是依律他应该被处以极刑、凌迟刑,而在受刑前他死了,往往要被戮尸或者是枭示。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刑部在奏折里使用了“锉尸

枭示”一词,即将死去五十余年的人的棺材剖开,取出尸骨,予以羞辱。然后,雍正又做出一副很公允的样子,命令将刑部的建议发交各省学政,通过专门管理读书人的学政把刑部奏折的决定通晓各地,让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吕留良的罪行和处刑。除此之外,雍正帝允许在学生监(在各级官办学校读书的学生)各抒己见,地方官员不得隐匿不报,想借此试探社会舆论。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手段,是典型的《韩非子》所说的“倒言反事”,或可谓雍正版的“引蛇出洞”。但这在形式上表露出来的却是皇帝的宽仁公道,虚心听取各方不同意见。

浙江台州一位名叫齐周华的读书人,写了一份意见,认为吕留良的文集、日记宣扬的都是圣人道德,并无不妥,而且其人已过世五十余年,与曾静谋反一事实没有关联,朝廷不应该对吕留良戮尸枭示并禁毁其全部著述。齐周华认真拟具意见,上交地方学政。学政知道此事并不简单,生怕连累自己,就强压下来,没有向上转呈。齐周华对学政的做法大为不满,索性带着意见书直赴京城,投交刑部。刑部官员接到了这样的一份意见,同样感到十分棘手,借口说直接投书属于越级上诉,有违《大清律例》,把他押解回浙江,交地方官处理。浙江巡抚和学政亦左右为难,若不转呈意见,属于抗旨不遵,若转呈意见,难免被牵连进去。他们劝说齐周华打消上呈意见的想法,但齐周华不为所动,坚持独抒己见。于是巡抚学政捏造罪名,借口齐周华素与学政有隙,挟嫌报复,坐为诬告,拟定流刑,然后向刑部具提奏本,等候发落。此时恰逢闽浙总督出巡台州,齐周华让自己的儿子拦轿喊冤。总督听闻此事不敢隐瞒,直接汇报雍正帝。真正出现了不同意见,雍正帝立刻撕去公正宽容的面纱,明确指令地方督抚对齐周华严加管束,交由地方终身锁锢。

卸下虚伪面具的雍正帝, 决定在吕留良一案上做足文章, 目的在于将人们的视线从他个人是否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具体问题上, 转移到“华夷之辨”、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等问题, 可谓用心良苦。而这也正应验“出奇料理”四个字。

乾隆帝改弦,《大义觉迷录》被禁

雍正帝想要在《大义觉迷录》一书当中, 达成他的政治追求。他通过曾静认罪的口吻来批判吕留良的反清思想。雍正帝通过曾静的自我批判说明华夷之辨毫无道理。“夷”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 中国历史上在远古时期被人们崇奉的帝王的代表都曾被视作“夷”, 舜被称为东夷, 周文王被称为西夷。所谓的“华夷之辨”, 同籍贯一样, 不足以认定民族利害关系。雍正试图用一种地理位置概念, 来偷换汉族士大夫思想中的民族观念, 进而证明清王朝建立者的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是合理合法的。

诸如此类的话题,《大义觉迷录》里常常出现, 雍正帝通过对曾静的批驳, 通过曾静的自我检讨, 达到他想要的政治目的。故此, 雍正皇帝很看重这部《大义觉迷录》, 特别发布了一道旨意, 要求各地的学官要保证所有读书人都能看到此书。进而命令朝臣针对吕留良的著述, 逐条加以批驳, 把吕留良的言论, 编成各种批判性参考文献, 同样发交地方。

雍正十年年底, 雍正皇帝自信读书人都已幡然醒悟, 没有人会赞同吕留良的观点了, 于是, 接受刑部重新启奏处分吕留良的奏折。吕留良、他的学生严鸿逵以及他曾考中进士的儿子吕葆中, 三人被开棺戮尸。此外, 吕留良的学生和吕氏一门, 按照清代有关大逆不道罪名的规定, 被连带坐罪。清律沿袭唐律, 但是更为严厉, 凡是重罪, 株连范围惊人。被株连家族

中, 凡 15 岁以上之男性, 都被处斩, 未满 15 岁之男性, 被处以阉割之刑, 女子被分配功臣家为奴。此案牵连甚广, 仅吕氏家族就人数众多, 雍正帝此时又要表示出皇帝的宽仁, 免除吕氏满门死刑, 将所有人发遣至宁古塔给批甲人为奴。

曾静、吕留良两案最终有了完全出乎所料的结果。雍正帝在此案中的出奇料理, 对清代的文字狱, 贡献颇多。后人撰文说雍正帝这一系列的处断, 其风流余韵至今不能说全无影响。但是, 这起投书谋反案并未就此完结。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喋喋不休的表白、辩护, 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使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宫廷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 朝野上下、全国城乡都知道了雍正皇帝竟然有谋父篡位以及种种无行无德的说法。而文中漏洞百出的辩解, 又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雍正帝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雍正十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雍正帝驾崩了, 他的儿子弘历继位, 是为乾隆皇帝。按照当时的制度, 这一年并没有改元, 仍然称为雍正十三年。乾隆甫一登基, 就重新检讨他的父亲生前对曾静一案的处理。

虽然在雍正帝看来,《大义觉迷录》已经把吕留良的“华夷之辨”观念驳倒了, 但是就客观而言, 无人能够保证汉族读书人不会继续持有这种观念。乾隆帝认为, 无论如何雍正帝的举措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乾隆帝当机立断, 下旨命令湖南地方长官, 将曾静、张熙这两个人重新捉拿归案。同年十二月十九日, 曾、张两人被押解到京后, 乾隆帝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 大逆不道, 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 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并将有关这两案的材料及《大义觉迷录》等书全部收回。此后,

不仅吕留良的著述被尽数禁毁, 他人著述中有关吕留良的文字亦全部抽毁。而且, 连本朝皇帝的御制国书——《大义觉迷录》也成了禁书, 这在历史上亦可谓绝无仅有。

乾隆帝公然违抗父命而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原因有多方面, 但主要是曾静、吕留良两案的公开审理, 实际上把雍正帝推到被告席一方, 为证明未曾“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 他举出一系列事实进行辩护, 把宫中、朝中被认为绝密材料, 如康熙家庭生活的悲剧、诸皇子党争、诸大臣朋党之间的摩擦等, 公布于众。此举严重影响统治者的形象, 对华夷之辨也起了极大的宣传作用。留着曾、张两个反面教材, 随时提醒人们不忘记雍正帝“失德”的“秽行”, 乾隆帝当然不能再容忍, 遂有此决断。

当初雍正帝决定不杀曾静、张熙时曾专门下了一道谕令, 命子孙后代同样不能杀曾静, 但提及吕留良时却强调他罪在不赦的理由是: 吕留良不仅诋毁本朝, 更在文集当中公然对圣祖康熙皇帝不敬, 这样的人一定要被严惩。乾隆帝是雍正帝的儿子, 本不应作出违背父亲旨意的事情, 方才符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教导。但是乾隆帝处死曾静的理由也很充分, 因为曾静曾在书信中诬蔑侮辱乾隆帝的父皇, 同样罪在不赦。在后来的《东华录》中, 简短提到十个字: 雍正十三年冬, 曾静伏诛。

曾静投书谋反案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 并不仅仅是因为案件本身, 而是它所反映出的在封建帝制下, 特别是雍正皇帝对这个案件所做的一番政治上的追求。尤其在中国传统社会, 读书人在思想、精神上所遭受到的屈辱和打压。清代文字狱乾隆朝最多, 但论其影响和意义, 无出此案之右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